

写 作 文 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写 作 文 选

(内部发行)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83年·武汉

写 作 文 选

(内部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 9 1/2 印張 • 194,000字 印数 11,001—15,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03·494

定价：(10) 0.85 元

編 者 的 話

我們編輯了這本寫作資料，是供給一些宣傳文教幹部、報刊出版編輯和政治理論教員學習寫作時閱讀的。

寫文章是腦力勞動的一種基本技能。我們做宣教工作的人，學會寫文章就更重要。我們做工作，和文字打交道的时候很多，由於我們文字表達能力差，有時即使有材料、有觀點，也不容易寫出一篇象樣的文章來。“提起筆來，重得很”。這件事，我們常常感到很痛苦，因為它對我們工作效率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怎麼辦呢？只好大家拿起筆來多寫多練，除此而外還應該多學習，多讀、多想、多記。

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等著作，正是我們學習寫作必讀的經典著作。

毛主席還教導我們寫文章要作到準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三性”具備，這是比較高的要求。但是對我們做宣教工作的人來說，卻是應該力求做到的。如果一下子還做不到，也不妨分作幾步走。第一步，下功夫做到“言之有物，文理通順”。然後，再不斷努力，向“三性”進軍。這也是我們編輯這本資料的目的。

由於材料掌握得有限，編輯得也比較匆忙，難免有許多不到之處。希望同志們讀後，把意見和要求告訴我們。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目 录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 (1)

关于文风问题

——答《新观察》记者问郭沫若 (7)

写文章的关谢觉哉 (15)

关于写文章施东向 (19)

拿起笔来之前叶圣陶 (23)

大学国文序叶圣陶 (30)

分析综合与典型问题陈伯达 (37)

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胡乔木 (44)

短些,再短些!胡乔木 (49)

关于评论写作的几个问题《新闻战线》编辑室 (61)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厚 今 (59)

抓住特点,具体地说明特点

——关于通讯写作华 山 (77)

关于新闻写作问题石西民 (115)

写评论也要采访程 予 (123)

谈国防部文告的风格朱德熙 (131)

标题也要讲求艺术 昭 彦(135)

向社会学习 唐 骏(137)

义理、考据和辞章 施东向(150)

试谈积累知识和描绘事物 秦 牧(158)

打倒洋八股 老 舍(174)

我怎样学习语言 老 舍(180)

语言学习杂感 曹 隅(186)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郭预衡(197)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赵树理(204)

谈修改文章 何其芳(216)

《春秋》笔法 振 甫(220)

从诗话词话中学习写作技巧 振 甫(236)

《聊斋志异》的画龙点睛与画蛇添足 聂绀弩(255)

诗的开头和结尾 張广均
石 榕(259)

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写作态度和方法

..... 威廉·李卜克内西
保尔·拉 法 格(264)

附录: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

标点符号用法 (275)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 为語言的純洁和健康而斗争！

《人民日报》社論

語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語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語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呂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語法修辭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

我們的語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語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語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吳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語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国现代語言保存了我国語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

语汇成份和语法成份。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但是,如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关于语言问题的指示来检查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先拿词汇来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见《反对党八股》一文)鲁迅先生的文字,正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这些原则的模范。鲁迅先生曾经特别指出要反对“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对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

的这些指示,很多人没有认真执行,甚至根本没有记在心上。他们不但不重视和不肯好好研究祖国的语言,相反地,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种词。他们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从地方机关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援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语,以及“美帝”(美帝国主义)、“双减”(减租减息)、“生救”(生产自救)、“匪特”(土匪特务)等等老牌的略语。这种混乱现象大部分发生在报纸杂志的文章和党组织及政府机关的文件上,并且被这些文章和文件所推广,以致滥用省略成为通病。

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文法或语法,正如斯大林所说,“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标”,修辞和逻辑,也有同样的性质。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我们的干部无论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句子。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下面的例子是随便从报纸

上摘引来的。

“我們非要加紧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不可”（五月五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

“青年团东北委员会、东北学生联合会联合发表演说”（二月二十二日沈阳《劳动日报》第一版）；

“取得了某些收效”（二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第二版）；

“这五万万人，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五月二十五日西安《新青年报》第三版）。

以上四个例子的前一个有语法错误，后三个不合理。既然报纸上不时地出现这种情形，那就应当当作一种问题，采取严肃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诿之于一般作者和编辑文化程度太低。让我们再一次引用苏联航空工程师、科学院通讯院士雅可夫列夫所转述的斯大林的话吧：

“斯大林不能容忍文理不通的现象。当他接到字句不通的文件时，他就气愤起来。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若责备他一下，他马上就会说他是工农出身，藉以解释自己文盲的原因。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这是不爱文化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别在国防事业中更不允许拿工农出身来解释自己教育程度的不足，来解释自己没有技术准备、粗鲁或不通事理。因为敌人绝不会因我们的社会出身而向我们让步。正因为我们是工农，我们更应当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周详完备的准备，毫不亚于敌人才对”。（见《论伟大而质朴的人》一文）

在整个的篇章结构上，我们许多同志的主要毛病是空话连篇，缺乏条理。毛泽东同志把空话连篇当作党八股八大罪状中的第一条，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

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按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么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么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对于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我们同样有很多人没有执行。仍然有许多文章和文件是空话连篇，篇幅冗长的。有些文章和文件不但冗长，而且因为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反而没有把事情说得明白。交代不明，眉目不清，也是常见的缺点。从这些文章和文件可以看出，有很多人没有用过功夫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各种权威的文学和科学的著作，没有用研究这些著作来训练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头脑趋于精密和有条理，所以就不能把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条理正确地表现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了。

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对于人民的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

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

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及其以前的时代，那些官僚政客们使用文字的范围和作用有限，所以他们文理不通，作出又长又臭的文章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也有限。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了。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

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中国语言的规律并不难学。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所谓学者和中国的买办，在过去几十年来一贯地诬蔑中国语言“没有规律”，“不科学”，事实上是他们没有学通中国语言。我们应当坚决地反对这种诬蔑。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

关于文风問題

——答《新观察》記者問

郭沫若

一、您認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鮮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問題。古語說：“文如其人”，這是說什麼樣的人，就寫什麼樣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鮮明、生动，首先要看寫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場、作风怎樣。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鮮明、作风正派，那麼，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鮮明性。這是基本問題。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問題。寫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總得懂一點邏輯、文法和修辭。寫文章的目的是給人家看的，不是給你自已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懂。要把你的思想表達出來，傳達給別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見解，然後如实地表達出來。你所看到的客觀事物，總要使得沒有看到的人也渾如在眼前。而要做到這樣，當然要懂得一點邏輯和文法，因為不合邏輯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實一點，是做到准确的好辦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詣地去修飾。邏輯和文法，其實也就是老老實實的方法。我們平常講

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比较容易准确；一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糟糕了。（说到这里，郭老笑着对在座记录的两位女同志说：“比如女同志打扮得好的很漂亮，打扮得不好的就糟了。”引得哄堂大笑起来。）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象胡风、冯雪峰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法和章段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们学过来是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象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长，段节也不宜太长。这样就容易分析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鲜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要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诗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绘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间、标点与标点之间有些空白，就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说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调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钢琴来检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谐。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费点功夫。所谓锤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复去的推敲一下。“推敲”这两个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门”。“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说寺门掩闭，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的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

所谓千锤百炼，不一定要“锤”千次“炼”百次，但象毛主席说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连过目都不过，结果就出了差错。

这里说的准确、鲜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论性、叙述体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诗词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说。

二、文风问题是不是单纯的語言問題？

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是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三、在文风上，您认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哪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是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记得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主